

夫人眼中的草婴(上)

◆ 许祖馨

草婴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长辈,认识他多年,一直想写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得知草婴夫人盛天民老师正在打造草婴书房,便前去拜访,听她谈起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他像大哥一样引导我”

1943年,盛天民在江苏省第二中学(今松江二中)念初三。同学们说高三有一个口才好、能力强、水平高的男同学。她便开始留意这个男生。果然,他为人沉稳大方,平时骑一辆三枪牌自行车,前车兜里总放着不少书籍,有的是同学向他借的,有的是同学还给他的。在这些书中,有鲁迅的作品,有苏联作家的作品,也有不少进步杂志。因为他爱看书,所以身旁总聚集着一批爱看书的同学。

这个男生就是盛峻峰(草婴)。当年,盛峻峰刚满20岁,读高三,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他家生活条件不错,父亲是宁波铁路医院的院长,很开明;盛峻峰独自有一间不小的房间,平时,他经常组织同学们到他的房内读书讨论。这个像大哥一样稳重的男生,是高三班长,被同学们戏称为“船长”。

经班里一位女同学介绍,盛天民认识了盛峻峰。刚满16岁的盛天民对盛峻峰充满了好感,他们经常在一起看进步书籍,并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共同的理想使两个人的心越走越近,不久就成了好朋友。盛天民说,当时他在我心中就像大哥一样,经常教导我们。而盛天民当时虽然是学生,却已经是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员了。

1947年,共同的理想和爱好,使得两个年轻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在八仙桥青年会,他俩在牧师的见证下结为了夫妻。

盛天民给我看了一张她珍藏多年的照片。这是她和草婴当年的结婚照。照片上的盛天民年轻美丽,一旁的盛峻峰英俊潇洒,稳重大方。盛天民告诉我,这张照片是结婚当天拍摄的。他俩能走到一起颇为坎坷,当初遭到了盛天民母亲的反对。由于当时盛峻峰比较进步,母亲担心盛天民会受其影响。其实,盛天民入党比盛峻峰还要早。在他俩的坚持下,母亲最终答应了他们的婚事,但是希望他们的婚礼按照西方习俗来办。在当时八仙桥的青年会,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翻译家草婴于2015年10月24日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3岁,《上海滩》杂志11月刊刊登了《夫人眼中的草婴》,以向这位为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前辈及家属表示深切敬意。



2005年,草婴夫妇在家中合影

最爱读鲁迅作品

盛天民说,草婴是最崇拜鲁迅的,最喜欢读鲁迅的作品。早在读中学时,那时刚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定价20元,预订是8元。要知道,在当时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因为一个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才两三元。

可是他爱书如命,尤其是喜欢《鲁迅全集》。他省吃俭用,将父亲给的零花钱攒下来,买了一套《鲁迅全集》,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看完后,他还借给同学看。盛天民当时也向他借过。这套珍贵的书在“文革”中被抄走,所幸后来又还给了他们。如今,盛天民把它珍藏在书架上的最高层。

《鲁迅全集》后十卷是鲁迅的翻译作品,这对草婴后来走上文学翻译道路,影响巨大。盛天民说,鲁迅作品是草婴最为重要的生活教科书。他说鲁迅站得高看得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巨人。而鲁迅从事翻译工作,也是为了借他山之石,以鼓起中国民众反

帝反封建的勇气,并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提高创作水平,借此来达到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目的。他认为鲁迅的翻译做到了信、达、雅。

草婴曾经说,鲁迅在身体不好、时间又紧张的情况下,翻译了不少俄罗斯、日本及东欧一些弱小国家民族的作品。这些地方的人们也饱受压迫与灾难,和中国人民的处境如此相似,这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少的精神食粮,他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也成了草婴翻译苏联作品的精神动力。

最反感抽烟赌博

草婴先生对自己要求极严,生活品位高。盛天民说他几十年来一贯如此。

草婴爱听西洋古典音乐。还在学生时代,就买了不少唱片,把爱好音乐的同学带到家一起欣赏。他特别爱听俄罗斯古典音乐,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百听不厌。后来他俩结婚,有了孩子,便和孩子们一起听,家里气氛融洽,充满了欢乐。盛天民说,草婴开始时买了不少

老唱片,后来买了很多碟片,他简直可以当碟片收藏家了。

草婴从来不抽烟,也反对家里人抽烟。他的家里从不备香烟,如有客人要抽,他就请他们到楼下园子里抽,即使是再好的朋友也不例外。

草婴反对赌博,自己更是以身作则。1993年,全家去美国拉斯维加斯游玩。孩子们对“老虎机”很好奇,便怂恿草婴去玩一玩。盛天民将几枚角子塞给草婴,遭到草婴的坚决反对。在盛天民的记忆中,他确实从未碰过麻将、纸牌之类的东西,家中也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草婴高尚的情操也影响了下一代。1982年,小女儿盛姗姗用父亲3年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2000元稿费,换了一张出国机票。她十分珍惜父亲的辛劳,在事业上奋力拼搏,在绘画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她谈起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激动地说:“我的父母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3.同敌人周旋和斗争

在芦苇荡中的小渔船上,刘飞躺在门板上,想起“江抗”西撤前,党组织对留守伤病员的殷切嘱托:把同志们留在这里,并不单单是因为你们身体条件不行,跟不上主力队伍频繁流动,更重要的是党需要在东路留下一把火种!

党的信任和重托,东路抗日斗争对伤病员的倚重,使刘飞愈感自己责任的重大。面对蚊蝇叮咬和伤痛折磨,来自不同营连的伤病员像离群的孤雁,普遍不安心在芦苇中养伤。有的伤员随着身体逐渐痊愈,也产生了急躁情绪,想早日重返老部队。刘飞因势利导做伤病员的工作,教育引导大家,养伤既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党交给我们的重点任务,回部队同日伪顽真刀实枪地干精神固然可嘉,但留下来养好伤,在坚持阳澄湖敌后斗争中巩固苏常太抗日根据地,更有意义,是对革命的更大贡献。个人的良好愿望最终要服从革命斗争需要。在刘飞耐心诱导下,伤病员的心结渐渐解开了。鉴于敌人日夜追捕伤病员并封锁芦苇荡,刘飞把一些轻伤员组织起来担任警戒,让当地籍贯的伤病员带领大家采摘芦根菱角和鸡头米,边疏导,边工作,使伤病员的思想逐步稳定下来。

十几天后,刘飞目睹“江抗”西撤后日伪军的横行无忌,亲身感受群众日夜盼望“江抗”重返东路的迫切心情,考虑到多数伤病员身体开始康复,正式向上级打报告要求重建“江抗”。金秋10月,“江抗”5路政治处主任张志强,专程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赶到阳澄湖后方医院,代表陈毅看望刘飞等伤病员,介绍了当前“江抗”主力首要任务是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马上就要北上的情况,并捎话给刘飞,陈毅司令员要留守在阳澄湖的伤病员和当地武装力量组织东路抗日游击武装。不久,陈毅批准了刘飞重建“江抗”的建议。

萧瑟的秋风掠过芦苇,在同日伪周旋中再度隐身湖上的伤病员,更觉饥寒难耐。作为



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领导者,刘飞躺在小船中的门板上,肩上仿佛压着千钧重担,思绪像波宕的湖水一样在翻滚。参加革命13年来,他还从未孤悬敌后,在如此困难和特殊的环境中,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周旋和坚持斗争。

刘飞深知,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继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之后,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在日伪顽重兵据守、各方势力和斗争形势犬牙交错的平原水乡,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江抗”西撤后,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存亡,系于后方医院几十个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一身!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养伤,而且要保证苏常太革命根据地红旗不倒,始终给人民以希望和力量!留下来的几十名伤病员,就是坚持敌后斗争和显示存在的革命火种。刘飞认为,目前,敌我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但权衡力量强弱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中,既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又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存南方独立开展艰苦卓绝3年游击战争的闽东红军战士,还有十几名信仰坚定、不怕牺牲的白衣战士,有些亲身经历、久经考验的革命火种,有当地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东路地区抗日根据地,就一定会像尖刀一样,牢牢楔在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

刘飞的想法得到了中共江南特委和常熟县委的重视。特委组织部长张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常熟“民抗”司令员任天石,经常来到刘飞隐蔽的地方,一起研究如何坚持敌后斗争的问题。一天,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油印小册子。刘飞和大家一起学习后,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刘飞想,“江抗”在的时候,经常截击“扫荡”的敌人,炸毁敌人运兵运粮的船只,并在主要水道打下明桩暗坝,分段切断,使敌人的水上交通处于肢解瘫痪状态。现在,虽然“江抗”西撤,但党的组织还在,伤病员这些骨干还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还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按照党的要求继续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积极创造条件,就一定会迎来东路抗日根据地再度兴盛的那一天。

15.上海镇的兴起

元时镇市规模尚存,然已“无复海商之往来矣”,海上贸易飘然衰落,市镇繁荣不再。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六月,朝廷撤销了设在华亭县的两浙市舶司,到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华亭县又撤销了两浙市舶司,继而起的是上海镇的兴起。

上海镇在青龙镇的东南,同治《上海县志》卷一“疆域”记载,宋熙宁七年(1074年)宋朝政府就在这里设镇,同时设立“市舶提举司和榷货场”。清嘉庆《上海县志》载,当时的“市舶提举司”设在龙华附近高昌乡以西。以此来分析,上海镇的地域就相当于今黄浦区小东门十六铺的岸边。

还在青龙镇处于长江口主要港口地位时,由于吴淞江经常淤塞,上海镇就已经开始发力了。后来青龙镇淤塞严重,船舶进出困难,上海镇逐步取代了青龙镇的地位,成为长江口的主要港口。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政府在上海设立“市舶司”,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即今宁波)和澈浦并列为全国七大“市舶司”。这时的上海镇已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重要港口了。

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宁波)和澈浦并列为全国七大“市舶司”,这时的上海镇已空前繁盛,“市舶司”的地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今天拿到国家认同的“自贸区”地位一样,使得从上海浦西岸的商业和海外贸易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在元代,吴淞江入海口继续淤塞,大船进不了,大宗贸易受到严重制约,元大德二年(1298年),元朝政府只好吊销上海“市舶司”的执照,将其并入庆元(今宁波)港,这样,刚刚诞生的上海县,经历了宋末和元初的繁盛期,渐次步入式微,长江口主要港口的位置再次发生迁移与变动,于是,给了两个港口以机会,这就是浏河港勃兴与江湾港的兴起。

浏河港叫刘家港,也叫浏河,在长江口的南岸,今江苏太仓境内,现与上海嘉定区接壤。元朝初期的浏河,号称“口宽二十丈,水深一百尺”,可以容纳“万斛之舟”,元朝政府曾

经将它作为海运漕粮的漕运基地。及至明朝初期,浏河港还是盛势不衰。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的十二年中,元政府海运漕粮的路线改变过三次。从第三次起就从浏河镇出发,经崇明出海,向北过成山角进入渤海湾,又过莱州湾到达天津。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政府海运漕粮只有四万六千石,自从选择浏河镇出海路线之后,由

于港口宽敞,集散方便,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漕运数量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万石。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又增至二百四十六万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更是猛增到三百五十二万石。漕运数量直线上升,运漕船只不断增加,必然要有相应的港口设施为之配套与服务,可见浏河港那个时代在经济上的地位了。

明朝开国,浏河镇和港口依然保持着上升的势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朝政府在太仓设立“市舶司”。航海家郑和,多次率领庞大船队,从浏河港扬帆出海。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船队由六十二艘大小船舶,二万七千八百多人组成。最大的“宝船”长约一百五十米,舵杆长十一米零七米,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舵艄,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能够集中和动用如此庞大的船队,说明当时的造船设施和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说明集中这样一支船队的浏河镇内应该有相当数量的码头仓库、装卸设备和港内水陆运输条件。因此元代和明初的浏河港,“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浏河港替代了吴淞江成为太湖地区的出海口。然而,泥沙无情,不断淤积的泥沙,成为浏河港的进出大患,从乾隆初年起,因受海潮的长期顶托,特别是浏河港的拦门沙,长达十多里,横亘在航道口,严重阻碍了船舶的进出,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得逐渐走向衰落。

南宋中期,随着青龙镇海上贸易的下滑,乾道二年(1166年)两浙市舶司被撤废,伴随着青龙镇衰落,今天上海地区境内的上海镇、黄姚镇、江湾镇兴起。

醉上海

仲富兰

